

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

石明明，江舟，周小焱

[摘要] 新一轮“消费升级”是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消费升级的基准框架，围绕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演变，分别从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两个层面对消费升级内涵进行分析。其中，消费结构部分使用微观数据与宏观数据进行了相互印证。消费结构层面的分析表明，1998—2017年，中国城乡居民的第Ⅰ类消费升级（食品等生存性消费占比下降）和第Ⅱ类消费升级（符号性和服务性消费占比上升）均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但乡村居民的第Ⅰ类消费升级效应小于城镇居民；2013年以后，随着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第Ⅱ类消费升级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居住类支出对其他消费支出形成了较大的挤出效应。消费习惯层面的分析显示，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大于40%和小于40%的居民，其消费行为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乡村居民和恩格尔系数大于40%的居民，其总消费和分项消费增长受到的制约因素更多。本文的研究为部分存在的消费降级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关键词] 消费升级；消费降级；粘性消费增长；近似理想需求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9)07-0042-19

一、引言

近年来，新一轮“消费升级”成为中国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可获得商品和服务数量与种类的大幅提升，以及消费偏好与消费文化的转变，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先下降后逐步增强，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消费增长形成支撑，互联网时代新消费模式出现使定制化、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成为主流。尽管从宏观层面看，国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是从结构和微观层面看，一些负面因素对家庭消费的潜在影响正在受到关注，例如：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房价高企对家庭消费形成债务挤出效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对相关行业职工持续增收和前景预期带来的负面影响等。“消费降级”的讨论日益增多，有观点认为低廉商品如榨菜等销量的上升以及拼购网站廉价伪劣商品和服务的热潮，是出现消费降级的重要证据，也有相反意见认为高档品和低档品的销量是同步上

[收稿日期] 2018-12-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黏性消费增长框架下城镇化扩大消费的潜力评估与效应模拟”（批准号414011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我国家庭消费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批准号18FJY018）。

[作者简介] 石明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江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周小焱，美国普渡大学克兰纳特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石明明，电子邮箱：ms@ruc.edu.cn。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升的,同一种商品可能在不同人群中有着不同的定位,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成本降低是商品和服务价格降低的根源,并不能以此判定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那么,到底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了呢?可以看到,已有观点的讨论集中于部分商品的消费现象,缺乏全面理解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和习惯的动态演变分析。因此,本文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深入分析消费升级的具体经济涵义和可能的动态趋势,具有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升级既关系到人民生活的真实效用水平是否真正提高,还关系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模式转换。随着国民经济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轨道,如何有效地激发居民消费需求,日益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将“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明确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也先后密集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7〕40号)等政策措施。这显示,着力破除制约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已经上升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关切点和着力点。

本文将围绕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演变,分别从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两个层面对消费升级内涵进行分析。关于消费结构,厉以宁(1984)提出“消费结构是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尹世杰(2007)认为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消费过程中所消费各种不同类型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田晖(2006)则认为“理论上讲,消费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消费者所消费各种消费资料(包括物质资料和劳务)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些定义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本文认为消费升级需要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变化,表现为各类消费支出在微观结构和层次上的提升,例如,居民消费从生存型向享受和发展型、由物质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其理论逻辑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等为代表;二是消费升级是居民消费意愿的改变,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带来高消费意愿,消费意愿的改变需要消费者依据信息适应性做出消费决策调整,对消费项目有更多的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对新品牌、新产品、新服务有更多的新增消费等,宏观层面表现为消费的可持续增长,以习惯形成、粘性信息、耐久效应为代表,较新的理论以卡罗尔等的粘性消费增长(Sticky Consumption Growth)理论为代表。本文将借鉴 Carroll et al.(2018)的研究,采用中国1998—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结合 AIDS 模型和粘性消费增长理论,研究了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以及消费升级可能的制约因素,研究对于从理论上进一步理解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的真实特征,把握居民消费结构的发展动态,富有针对性地引导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研究的边际贡献概括为如下三点:①理论研究上,本文综合了 Taylor and Houthakker(2010)等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炼了消费升级的内涵,并论述其在经验研究方面的具体涵义;同时研究结合 Carroll et al.(2018)的思想,将 AIDS 分析框架与习惯形成、粘性信息与耐久效应消费增长分析框架进行了有机融合,并应用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动态变化及其蕴含的消费升级内涵的经验分析。②研究使用 1998—2017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 AIDS 模型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跨度 20 年的计量分析,估计了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对消费升级的动态趋势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城乡居民消费中存在粘性效应、耐久效应等进行了综合估计。论文同时采用了部分时间阶段可得的微观家庭数据与宏观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了相互印证。③研究表明,1998—2017 年中国城乡居民的第 I 类消费升级和第 II 类消费升级持续不断地进行,其中,乡村居民的第 I

类消费升级效应小于城镇居民;2013年以后,随着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第Ⅱ类消费升级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居住类支出对其他消费支出形成了较大的挤出效应。基于习惯形成、粘性信息或耐久效应的参数估计显示,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大于40%和小于40%的群体,其消费特征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论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简短的文献述评,第三部分介绍研究的基准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第四部分计算并分析了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估计结果和城乡居民不同的消费增长行为;第五部分为研究的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述评

应用标准经济学方法对消费升级开展的研究,一部分集中在消费结构研究领域,较为常见的模型有ELES模型、AIDS模型及扩展的AIDS模型等,主要思路是对消费者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或价格弹性等进行估计,探讨各项消费或某项消费支出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其中,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提出的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IDS)由于对需求函数拟合灵活、符合经济学消费者偏好理论等良好性质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献采用消费结构模型探讨居民消费结构的特征与变化规律。黄隽和李冀恺(2018)使用ELES模型对中国2013—2016年宏观居民消费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高层次消费支出占比有显著提高。部分学者采用家庭调查微观数据探究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如赵昕东和汪勇(2013)根据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食品价格上涨对城镇家庭消费行为与福利的影响。张颖熙(2014)研究了城镇居民家庭服务、教育、医疗等七类服务性消费的需求弹性。元惠连等(2016)使用CHIP1995年、2002年数据研究认为城镇居民的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的负担越来越重。唐琦等(2018)使用了加入CHIP2013年数据后的研究发现住房消费比例的不断上升显著挤出了其他家庭消费并降低了总需求。相比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对乡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研究相对较少,并主要关注其某一类消费如食品、医疗等(谭涛等,2014)。部分研究表明乡村居民的家庭所在地、户主年龄、收入阶层等家庭特征显著影响其食品消费行为(张明杨和章棋,2015;王勇,2018)。还有部分研究关注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结构的影响与差异(张慧芳和朱雅玲,2017)。

采用消费结构模型可以通过得到各项消费的支出弹性、价格弹性等比较分析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特征和变化,而长期看,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进一步演变和发展趋势还与城乡居民各类消费的增长模式有关,如居民在配置收入和各项消费的动态过程中是否受到消费习惯的影响等。消费结构研究除关注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的经验分析之外,还有一部分研究更为关注消费结构的动态性。Blanciforti and Green(1983)研究认为习惯形成是需求方程残差自相关的原因,把习惯形成与AIDS模型的研究结合起来,引入动态结构可以检验价格和收入弹性估计之间的时间关系。Anderson and Blundell(1983)认为除习惯偏好外,预期和调整成本等都将影响消费者行为,构建了动态和静态的消费结构模型研究加拿大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变化,研究发现消费者的习惯偏好等显著影响其各项消费增长从而影响消费结构动态变化。Blundell et al.(1993)还结合AIDS模型与生命周期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各项商品的跨期消费决策。

关于家庭或个人如何配置收入的动态消费问题,自凯恩斯提出绝对收入假说以来,经济学家相继提出了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假说等。为了完善这些理论或假说,隐含一个重要但难以成立的假设——完全信息,Lucas(1973)和Fischer(1977)等提出了“有限信息”理论,Mankiw and Reis(2002)等后续又提出了“粘性信息”理论。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粘性信息的产生是由于习惯形

成,即无论是家庭部门还是生产部门,其消费决定不仅取决于当期消费,还与过去的消费习惯有关,因此对于现实的经济冲击会存在反应的时间。在此基础上,粘性消费增长理论由 Carroll (Carroll, 2003; Carroll et al., 2011) 首先提出。该理论结合了近年来经济学界非常流行的两大理论(粘性信息和习惯形成),用来分析消费、储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经济问题。本文认为消费结构演变将受城乡居民有限理性与消费习惯的影响,粘性信息的存在将影响各类消费支出增长从而对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产生影响。国外学者的许多研究证实了居民消费中的消费粘性效应。如 Carroll et al. (2011) 运用 13 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在控制了测量误差之后,消费粘性增长模型的表现大多数情况下分别优于随机游走模型 (Hall, 1978) 和经验法则模型 (Campbell and Mankiw, 1990)。国内学者对消费粘性的关注相对较少。彭兴韵 (2011) 总结了粘性信息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宋明月和臧旭恒 (2018) 研究发现乡村居民有较高的更新信息成本,加上收入不确定性,粘性信息下的预防性动机挤出了消费。大部分有关研究着重关注城乡居民习惯形成效应的实证分析,如艾春荣和汪伟 (2008) 从收入的角度认为在习惯偏好下中国城乡居民均呈现出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杭斌和闫新华 (2013) 运用习惯形成理论实证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现象。黄娅娜和宗庆庆 (2014) 研究认为中国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同时该效应存在家庭异质性,年轻、贫穷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具有更强的习惯效应。

综上,国内已有文献运用需求函数对消费结构的研究多为微观层面上的分析,关注某类消费支出的变化,而对于消费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的研究还不足。因此,本文借鉴 Carroll et al. (2018) 的思想,结合消费结构演变与消费习惯理论,探究消费结构的时间变化规律和动态趋势,并进一步从宏观上探讨城乡居民各类消费支出表现出的不同行为模式。

三、理论模型

1. 消费升级基准框架的理论解释

依据前述定义,消费升级在微观层面表现为随着预期可支配收入、商品和服务种类多样化与可获得性、质量等纵向差异化、销售价格、流动性约束、消费空间等的动态变化,居民重新调整消费在生命周期中的配置,变革消费方式和内容,优化支出在各类物品和服务之间的分配,使居民的效用函数曲线在生命周期上向上跃迁。在结构和宏观层面,表现为居民消费伴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消费制度优化等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消费层次的变化(即主导性商品或服务消费的变化)和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二者的表现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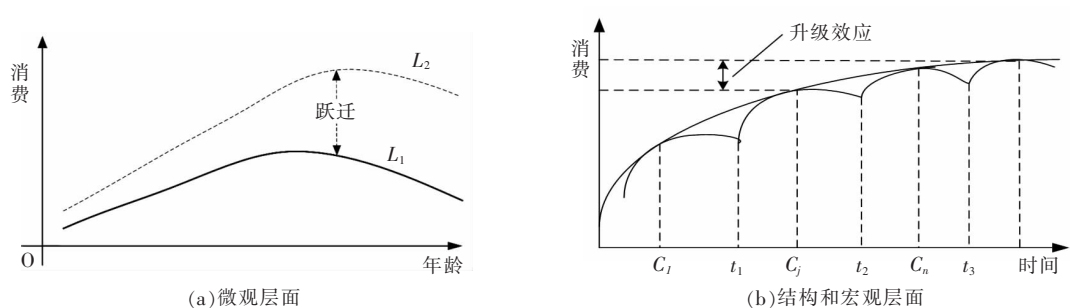


图 1 消费升级两个层面的表现

从消费升级方向上看,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消费行为与心理动机之间建立起一种逻辑关系。该理论认为,人类存在生理、安全、爱、自尊和自我实现五种基本的需求,这五种需求形成一

个严格的层次结构,在任何情况下,消费决策由更低级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决定;只有低层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进入更为高层的需求。需求层次理论尽管简单清晰,但作为一个解释框架,马斯洛需求层次结构的解释显然过于严格,在实证中往往难以验证。为此,Taylor and Houthakker(2010)拓展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五种需求层次与饮食、住房、公用事业、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其他支出等消费分项之间建立了映射关系,对与特定需求层次对应的相对重要的消费类别进行了区分,映射关系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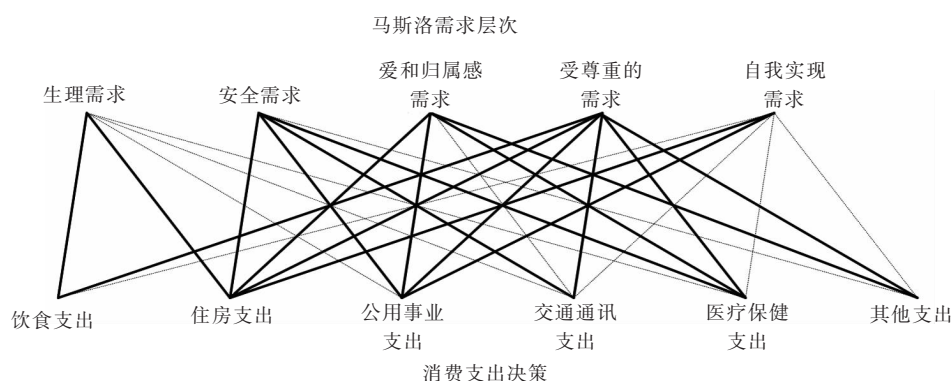


图2 马斯洛需求层次与消费支出类别的对应关系

图2中,上方是马斯洛的五种基本需求,下方是消费支出的一般分类,连线从需求指向支出类别,表明支出的动机是满足需求。正如图2所表明的,大多数消费活动服务于多样性需求,但由于不同类别消费具有特定的功能,因此某些消费项目将具有相对重要性,图2中通过实线体现。对于生理需求而言,连线指向所有类别支出,但饮食和住房是最重要的;安全需求指向住房、公用事业、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其他支出;爱和归属感需求指向所有除了饮食支出的类别;而受尊重的需求指向所有类别;自我实现的需求指向所有类别,但住房、公用事业更加重要。

上述理论为消费升级的方向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基准。总体来看,关于消费升级在消费结构层次上有两个自然的推论:

推论1(第I类消费升级):随着可支配收入的上升,食品支出占比持续下降。对这一关系的经济学验证,最著名的是恩格尔定律。由于在需求层次中,食物是一种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因此一旦被完全满足,它将不再在消费行为中体现。因此,恩格尔定律被形式化的表述为:随着家庭收入增加,食物支出份额会下降。需求的层次结构为这一定律提供了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

推论2(第II类消费升级):随着可支配收入的上升,物质性支出占比持续下降,根据,Taylor and Houthakker(2010)建构的映射关系,需求层次越高,越体现为安全、爱和归属感等精神性需求,因此家庭消费中符号性消费、服务性消费的比重将持续上升。

在上述基准框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结合家庭消费结构研究中的弹性分析与粘性增长讨论消费升级或降级的动态趋势。基本的思路是:通过不同消费类别的支出弹性观察其在家庭消费结构中的变化趋势,支出弹性大于1的商品将会在消费结构中占据更大的比重,体现消费变动的方向;支出弹性小于1,则表明该项消费的比重将下降。依据前述基准框架,消费结构升级首先体现为食物消费支出弹性小于1,其次表现为符号性、服务性消费支出弹性逐渐增大或大于1,体现为居民消费向服务类、文化类消费升级,而其他的物质性消费的支出弹性则逐渐降低甚至低于1。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结合习惯形成、信息粘性、耐久效应分析影响消费升级另一层次的涵义,通过分析总消

费和分类消费增长的习惯形成或粘性(Stickiness)效应、耐久(Durability)效应,研究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及不同的消费习惯变化。具有较高粘性信息或习惯形成的消费者其消费支出受制于已有的消费习惯或粘性信息,在经济低迷、收入前景不确定的情形下,习惯形成足够大的时候,消费者将更倾向于采用延迟消费、不进行新的消费支出,表现为依赖已有的消费流量,本文称之为耐久效应,模型和计量结果表现为与滞后期消费流量呈现负相关(特别是某几类耐用品或服务性支出更为明显)。因此,本文的一个边际贡献在于结合消费结构动态演进丰富了对消费升级的理论阐释,并进一步解释其理论机制。

2. AIDS 模型与粘性消费增长模型

基于分析框架,首先运用 AIDS 模型估计和分析居民的消费结构,并考察其时间变化。在此基础上,本文用粘性消费增长理论来强化对前者模型所预期的结构性变化的原因分析。本文将分阶段估计中国居民消费的弹性,以便更清晰地看到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以下是对两种分析方法的简单描述。

(1)AIDS 模型与消费结构。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年提出的 AIDS 模型是在价格和效用既定的情况下求解希克斯需求。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有许多优势。首先,消费受到收入和价格的双重影响,研究消费结构的改变,不能忽略价格因素,而既往的需求模型没有很好地将价格因素纳入。

AIDS 模型则灵活地考虑到价格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其次,AIDS 模型是一个从成本函数推导出的需求系统模型,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效用函数,形式灵活,因而可以检验需求理论中效用函数的对称性、齐次性等前提。AIDS 模型讨论在给定时间点上消费在不同商品之间的分配。假设消费者行为独立于价格的广义对数偏好(Price-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ogarithmic, PIGLOG),消费者的支出函数表示为如下形式:

$$\log C(u, p) = (1-u) \log a(p) + u \log b(p) \quad (1)$$

其中, u 衡量效用, $a(p)$ 和 $b(p)$ 分别表示消费者满足基本需求和最大效用时所需的最小支出。

$$\log a(p) = \alpha_0 + \sum_{i=1}^k \alpha_i \log p_i + \frac{1}{2} \sum_{i=1}^k \sum_{j=1}^k \gamma_{ij}^* \log p_i \log p_j \quad (2)$$

$$\log b(p) = \beta_0 \prod_{i=1}^k p_i^{\beta_i} + \log a(p) \quad (3)$$

其中, p_i 为商品 i 的价格指数, $i=1, \dots, k$ 。

将(2)、(3)式代入(1)式可得 AIDS 模型的支出函数。支出函数满足最小支出对价格求导为最优需求量,即 $\frac{\partial C(u, p)}{\partial p_i} = q_i$, q_i 为商品 i 的需求量,将支出函数等式两边同乘 $\frac{p_i}{C(u, p)}$ 可得:

$$w_i = \frac{p_i q_i}{C(u, p)} = \frac{\partial \log(C(u, p))}{\partial \log p_i} = \alpha_i + \sum_{j=1}^k \gamma_{ij} \log p_j + \beta_i u \beta_0 \prod_{i=1}^k p_i^{\beta_i} \quad (4)$$

其中, w_i 为商品 i 的支出份额, $\gamma_{ij} = \frac{1}{2}(\gamma_{ij}^* + \gamma_{ji}^*)$ 。假设消费者把实现效用水平 u 的最小支出 $C(u, p)$ 作为他的真实预算支出 m ,即 $C(u, p) = m$,则可由(4)式解出间接效用函数 $u(p, m)$,代入(5)式可得 AIDS 模型的预算份额构成式:

$$w_i = \alpha_i + \sum_{j=1}^k \gamma_{ij} \log p_j + \beta_i \log\left(\frac{m}{a(p)}\right) \quad (5)$$

其中, $\frac{m}{a(p)}$ 表示一种“真实消费支出”, α_i 、 γ_{ij} 、 β_i 为待估计参数。 γ_{ij} 表示真实消费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商品 j 价格的变化率对商品 i 支出份额的影响。 β_i 则表示价格不变时真实消费支出的变化导致

的商品 i 支出份额的改变,即实际消费改变,若 β_i 大于 0,则商品 i 为奢侈品,若 β_i 小于 0,则商品 i 为必需品。在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AIDS 模型需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sum_{i=1}^k \alpha_i = 1, \sum_{i=1}^k \beta_i = 0, \sum_{i=1}^k \gamma_{ij} = 0, \gamma_{ij} = \gamma_{ji}$$

约束条件保证了各项商品的支出之和等于总支出,以及当价格和收入等倍增长时,需求量保持不变。根据模型估计出的参数可进一步测算支出弹性和马歇尔需求价格弹性:

支出弹性为:

$$e_i = 1 + \frac{\beta_i}{w_i} \quad (6)$$

价格弹性为:

$$e_{ij} = -\delta_{ij} + \frac{1}{w_i} [\gamma_{ij} - \beta_i (\alpha_j + \sum_{i=1}^k \gamma_{ij} \ln p_k)] \quad (7)$$

其中, δ_{ij} 为克罗内克 δ 函数。

传统 AIDS 模型假设恩格尔系数的趋势是线性的,收入预算和支出的关系也是线性的。Banks et al.(1997)拓展了 AIDS 模型,在标准 AIDS 模型中加入收入二次项,得到了二次近似理想需求系统(QUAIDS):

$$w_i = \alpha_i + \sum_{j=1}^k \gamma_{ij} \ln p_j + \beta_i \ln \left(\frac{m}{a(p)} \right) + \frac{\lambda_i}{b(p)} \left[\ln \left(\frac{m}{a(p)} \right) \right]^2 \quad (8)$$

除满足 AIDS 模型的约束条件外,二次近似理想需求系统还要满足 $\sum_{i=1}^k \lambda_i = 0$ 。Poi(2002)还设定了由家庭特征函数和代表家庭的支出函数构成的支出函数,可以用于估计加入家庭特征的 QUAIDS 模型。

(2)习惯形成、信息粘性、耐久效应与消费增长。经济学最新的研究逐渐将不完全信息、消费习惯、消费心理等因素引入消费增长行为的研究。Carroll(Carroll,2003;Carroll et al.,2011)提出粘性消费增长框架,消费粘性包括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和粘性信息(Sticky Information)两个方面,由于消费者存在异质性预期(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深度习惯(Deep Habit)等差异,习惯形成和粘性信息作用的机制和渠道不同。Carroll et al.(2018)基于微观数据对消费粘性强度进行了考察,提出只要消费者中存在适度的信息摩擦,就会表现出一定的消费粘性;消费者对个人微观情况一般会有比较准确的知识,但对宏观经济信息存在“粘性预期”,即无法完美地(无摩擦地)注意到宏观冲击,这是粘性消费增长存在的重要微观原因。

粘性消费增长理论由粘性信息和习惯形成两部分构成:①粘性信息。Mankiw and Reis(2002)指出信息本身是不完全的,粘性信息的产生源于信息在人群中是缓慢传播的。Carroll(Carroll,2003;Carroll et al.,2011)在 Mankiw and Reis(2002)基础模型上考虑了粘性期望。传统的粘性信息理论认为,人们做出的预期通常都是不完全理性的。但 Carroll(Carroll,2003;Carroll et al.,2011)认为,经济人通过对新闻报道中专业预测的关注,可能会做出理性的决定,表现在 t 时期进行消费信息的更新。Carroll(Carroll,2003;Carroll et al.,2011)进一步提出了信息传播的完整情景,为 Mankiw and Reis(2002)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②习惯形成。Ryder and Heal(1973)首先指出消费者的消费会以滞后期消费为参照。Muellbauer(1988)的研究表明,习惯形成对消费者最大效用的确定有极大影响。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会受到如资本、储蓄、增长下滑等因素的冲击。Carroll et al.(1997)认为当受到冲击时,如储蓄和资本的暂时下降,消费者效用水平和总体经济的增长会出现一定减少。而相较

于考虑他人效用水平对自己效用影响的情况,习惯形成条件下,面对资本或产出的冲击,消费者效用和总体经济的下降会相对和缓,经济恢复到稳态也会更加迅速。因为只考虑习惯形成的条件下,当经济冲击发生时,习惯形成会对消费者效用和总体经济的变动产生一定的“缓冲”作用。在习惯形成基础上,Carroll et al.(2000)认为高增长会导致高储蓄。在引进习惯形成的增长模型中,除考虑资源、收入的效用外,习惯形成的效用也要充分考虑。在消费者看来,改变自身消费习惯会直接影响自身效用,至少不会让效用上升,这使得消费者自觉调整自己的消费增长,也就是所谓的“平滑消费”。Carroll 等认为,习惯形成的存在使消费者调整自己的消费增长率,而对于消费增长率的控制会导致储蓄的相对增加,因此高增长反而导致了高储蓄。

现有研究集中在考虑宏观冲击的基于 CRRA 效用函数的微观加总上,为了更好地研究消费增长的原因,本文对不同消费分项的支出增长进行了研究。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层次对应的主导消费品是不同的,消费者对非耐用品、耐用品、服务类消费增长表现为不同的增长原因,由于耐用品、服务类消费支出可以表现为一次性支付金额较大,后续各期会持续提供一个服务流量,表现为消费跨期之间的替代,因此本文的研究着重考虑了习惯形成、信息粘性与耐久效应。其中,消费流量和滞后一期消费流量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称之为耐久效应。本文后续的计量分析综合考虑了城乡消费结构的动态演变和不同的消费增长效应。

四、计量分析

1. 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论文采用 AIDS 模型及其二次型估计各类消费支出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以分析家庭消费结构的动态特征。数据来源包括两部分,宏观数据采用 1998—2017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微观数据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09 年、2011 年、2013 年、2015 年家庭数据以用于宏观结果相互印证。由于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具有异质性(如石明明和刘向东,2015),本文区分了城镇与乡村样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本文宏微观家庭消费支出都分为家庭总体消费支出、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设备与日用品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其他支出总计 9 个类别支出项目。宏微观数据均使用各省份城乡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作为价格指标,以 1998 年的价格为定基指数,进行指数化处理。资料中缺失的“其他”类支出的价格指数,本文借鉴唐琦等(2018)采用的方法,使用当年该省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代替。

宏观数据的描述统计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总支出水平高于乡村居民,整体趋势缓慢上升。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基本呈下降趋势,乡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则呈现出震荡上升的趋势。2004 年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乡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从各项消费支出占比看,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比小于乡村居民,但衣着支出、文教娱乐支出占比高于乡村居民。从时间发展的阶段性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整体表现出食品支出比重下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上升的结构变化。^①

2. 1998—2017 年居民消费结构动态:宏观数据分析结果

为更好地了解消费结构动态,借鉴王一鸣(2018)对宏观经济不同阶段的分类,本文把考察的时间阶段分为 1998—2002 年(“入世”之前)、2003—2007 年(“入世”红利期)、2008—2012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13—2017 年(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2002 年之前重要的宏观经济特征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1 年底中国加入 WTO 后,“入世”对中国经济、贸易、社会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薛荣久,2018)。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

^① 详细的描述统计图表可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下载。

剧收缩,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特征主要是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2012 年底,中国从全面反危机的政策轨道逐步退出。这个阶段,宏观经济失衡逐步由总量性失衡为主转向结构性失衡为主,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黄群慧,2014;王一鸣,2018)。根据 Poi(2012),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UR,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估计 AIDS 模型。为了防止过度识别产生奇异矩阵的问题,在估计参数时只选择 7 个方程,其他类需求的方程中各个参数可通过方程的约束条件求出。

(1)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动态分析。本文根据各项消费的支出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动态分析。表 1 报告了根据城镇样本估计结果测算出的支出弹性。商品支出弹性大于 1 表示该商品的支出份额变化大于总支出的变化,即随着收入提高,居民在增加消费支出时,更倾向于消费该类商品。相反,支出弹性小于 1 则表示该商品的支出份额变化小于总支出的变化,即其需求增加的速度慢于收入增加的速度,多为必需品。

时期	食品	衣着	居住	设备与日用品	交通通信	文教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
1998—2002	0.8941	0.4991	1.1688	1.1363	1.5836	1.2541	1.0772	0.7225
2003—2007	0.9080	0.5352	0.9129	1.0651	1.5002	1.2606	0.8490	1.1446
2008—2012	0.8797	0.6464	0.9775	0.9708	1.4409	1.4004	0.7596	1.0760
2013—2017	0.8630	0.6343	1.5889	0.8677	1.0054	0.9023	0.7865	1.1665

表 1 结果显示,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弹性和衣着支出弹性在四个阶段持续小于 1。其中,主要体现生存需要的食品支出弹性稍有下降,而同时体现生存和符号性消费的衣着支出弹性不断上升,从 1998—2002 年的 0.50 上升到 2013—2017 年的 0.63。居住的支出弹性 2003 年后略有下降,而后持续上升,到 2013—2017 年,达到 1.59,表明城镇居民对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和住房成本快速上升。设备与日用品支出弹性在 1998—2008 年略有下降,但维持在 1 以上,显示其略快于总体支出增长或二者保持同步,但是 2008—2017 年,支出弹性快速下降至低于 1,显示该项消费增长出现减速。交通通信类支出弹性在 1998—2012 年期间高达 1.50 左右,显示在这一阶段该类消费保持高速增长,这与中国这一阶段移动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相互契合。但是 2012 年以后,该项支出的弹性快速降低至 1.01,与总体支出增长保持基本同步。类似情况同样出现在文教娱乐消费方面,1998—2012 年同样是该项支出的快速增长阶段,2012 年之后则出现消费弹性的大幅下降,其支出增速低于总体消费支出的增速。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弹性持续下降,2012 年后仅有小幅上升,2003—2017 年其增速均低于总支出增速。

总体来看,中国城镇居民的第 I 类消费升级,即食品支出在支出份额中比重的减少在上述每一时间阶段都持续不断进行。服装、设备和日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消费具有一定的符号性、服务性特征,依据结果分析发现 1998—2012 年中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第 II 类消费升级,但是 2012 年以后升级势头放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居住类支出弹性出现大幅上涨,这一结果显示居住支出对其他消费支出形成了挤出效应。

表 2 报告了根据城镇样本估计结果测算出的各项消费自价格弹性。自价格弹性表示收入不变时,消费品自身价格变动 1%引起的该分项支出变化。根据经济理论,自价格弹性大于 1 为富有弹性,小于 1 则为缺乏弹性。价格弹性为负且绝对值越大,意味着随着该商品价格上涨减少的消费支出越多,绝对值越小表明随价格上涨减少的支出越少。

表 2 结果显示,除食品支出外,各项消费在所有时期自价格弹性均为负,表明价格提高会降低

表 2 城镇居民各项消费的自价格弹性(马歇尔价格弹性)

时期	食品	衣着	居住	设备与日用品	交通通信	文教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
1998—2002	0.0661	-1.4774	-0.9470	-0.7976	-2.044	-0.3220	-0.3309	0.2256
2003—2007	-0.9027	-1.1247	-0.2904	-1.0885	-1.1724	-0.8405	-0.7946	-3.4703
2008—2012	-1.1655	-0.9772	-0.4260	-1.0413	-1.3319	-0.8009	-0.6649	-0.6991
2013—2017	-1.6152	-0.9918	-0.8511	-1.0384	-1.4786	-0.6635	-0.5823	-0.6454

其需求量。城镇居民食品支出的自价格弹性 1998—2002 年为 0.07, 在 2003 年后发生了由正到负的转变, 而后绝对值不断上升到 2013—2017 年的 1.62, 富有弹性, 表明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对价格敏感, 一个合意的解释是城镇居民基本食物消费已得到较好满足, 食品价格上升使得食品支出下降, 食品支出更多体现在外出就餐等服务类消费。衣着支出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也有下降趋势, 2003—2017 年保持在 1.00 左右, 表明服装价格上升并未减少相应的服装支出, 城镇居民衣着消费体现出符号性消费的特征。居住支出、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持续波动但幅度较小, 绝对值均小于 1, 表现为缺乏弹性、对价格不敏感, 表明虽然居住价格、文教娱乐价格、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但城镇居民相应消费支出减少得却不多。设备与日用品自价格弹性绝对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其消费份额受自身价格波动影响较大。与之类似的是交通通信, 自价格弹性绝对值虽不断下降, 但依然富有弹性, 总体对自身价格较为敏感。

总体看, 假设收入不变的前提下, 城镇居民随着价格上涨减少的食品支出会越多, 表现出第 I 类消费升级, 对服装、居住、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减少相比于食品而言要少很多, 表现出对符号类、服务类商品的需求更多, 体现出第 II 类消费升级的特点。但是, 城镇居民在设备与日用品、交通通信支出上依然会随着价格上涨减少较多支出, 一个合意的解释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和通信行业的发展, 城镇居民这两类消费的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 会在消费支出中有意识地调整这两类支出, 表现出这两类消费对价格敏感, 价格上涨会导致消费减少较多。

(2) 乡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本文根据各项消费的支出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对乡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动态分析。表 3 报告了根据乡村样本估计结果测算出的支出弹性。表 3 结果显示, 乡村居民的食品支出弹性波动幅度较小且一直小于 1, 到 2013 后接近于 1, 略小于总支出增速。衣着消费的支出弹性在 2003 年后不断上升, 2008—2012 年达到 1.04, 此后有所下降, 略低于总体支出的增长速度。乡村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弹性总体大于 1 且较为稳定, 持续高于总支出增速, 表明其对住房环境改善的不断需要。设备与日用品的支出弹性波动较小, 基本保持在 1 左右, 显示其与总支出增长保持同步。与城镇居民类似, 乡村居民交通通信消费和文教娱乐消费的支出弹性在 1998—2012 年保持较高水平, 始终大于 1, 但在 2012 年以后支出弹性分别下降至 1.05 和 0.80, 表明 2012 年后交通通信消费增速基本与总支出同步而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增速低于总支出增速。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弹性 2008 年后持续小幅回落, 始终接近 1, 与总支出增长基本保持同步。

表 3 乡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弹性

时期	食品	衣着	居住	设备与日用品	交通通信	文教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
1998—2002	0.9339	0.4933	1.2040	0.9420	1.5553	1.0769	0.9399	1.1404
2003—2007	0.7610	0.9226	1.2519	1.2165	1.2409	1.3057	1.1842	1.2487
2008—2012	0.8334	1.0381	0.9774	0.9883	1.2346	1.4708	1.1108	1.2956
2013—2017	0.9190	0.8621	1.2288	0.9774	1.0504	0.8007	0.9702	1.1864

总体看,1998—2017年中国乡村居民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第Ⅰ类消费升级,即食品支出份额有所下降,尽管升级效应小于城镇居民。1998—2012年,设备与日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等保持较快的增长,体现为乡村居民的第Ⅱ类消费升级。2012年以后,设备与日用品、交通通信消费支出仍然保持与总支出同步增长,但代表服务性消费的文教娱乐支出增速出现较大下降,显示消费升级同样可能受到制约。1998—2017年乡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始终与总支出保持同步增长,显示乡村居民该项支出较多。

表4报告了乡村居民四个阶段各项消费的自价格弹性。与城镇居民相似,乡村居民食品支出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不断上升,从1998—2002年的0.70上升到2013—2017年的1.58,表明食品价格的上升将会导致乡村居民食品支出的显著下降。衣着支出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2003年后持续上升后又小幅下降,与城镇居民不同的是其绝对值均小于1,表明乡村居民对服装价格敏感性较低,价格上升并不会导致衣着支出较大幅度的下降,衣着消费更多体现生存性消费特征。与城镇居民居住支出自价格弹性形成对比的是,乡村居民的居住自价格弹性绝对值波动较大,从1998—2002年的1.19下降至2003—2007年的0.36,而后又上升到1.29,2013年后再次小幅下降,表明2003—2007年乡村居民的居住价格上升仅导致支出的小幅下降,而2007年后随着价格上升,支出下降幅度不断增加。结合居住消费支出弹性估计结果,这可能由于2005年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较大地拉动了乡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使其消费份额增加、价格敏感度下降。设备与日用品、交通通信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波动也较大且对自身价格敏感,价格上升导致消费份额的大幅下降。文教娱乐与医疗保健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始终小于1,缺乏弹性,对自身价格敏感度较低,甚至其价格弹性分别在2008—2012年与2003—2007年由负转正,表明文教娱乐与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在2008—2012年与2003—2007年两个阶段随着价格上升反而增加,表现为一种必需。

总体看,与城镇居民类似,在收入不变的前提下,乡村居民随着价格上涨减少的食品支出较多,体现出第Ⅰ类消费升级。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消费则缺乏弹性,随着价格上升支出减少相对较少,表现出对服务类商品的较大需求,体现出不同于城镇居民的Ⅱ类消费升级特点。同时,乡村居民也在设备与日用品和交通通信支出上有着较高的价格弹性,会随着价格上涨减少较多支出,表明这两类消费的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消费支出调整更加灵活。

(3)本部分研究总结。综上所述,从城乡居民支出弹性分析看出,城乡居民随着收入的增长食品支出增速始终小于总支出,表现出明显的第Ⅰ类消费升级,其中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比下降趋势明显,升级效应更加显著。但是,随着收入增长城乡居民第Ⅱ类消费升级特征存在异质性,城镇表现在服装、居住、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消费分项,乡村表现在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消费分项。从价格弹性分析看出,在假设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城乡居民食品支出的自价格弹性绝对值不断上升,表明价格上升会导致支出大幅减少,均体现出第Ⅰ类消费升级,与前述结果相互印证。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支出始终缺乏弹性,价格上升所导致的支出减少较小,体现出第Ⅱ类消费升级的特征。

表4 乡村居民各项消费的自价格弹性(马歇尔价格弹性)

时期	食品	衣着	居住	设备与日用品	交通通信	文教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
1998—2002	-0.7040	-0.3766	-1.1875	-1.3031	-1.4743	-0.7989	-0.0843	-0.4012
2003—2007	-0.7865	-0.8666	-0.3590	-1.6720	-2.5400	-0.4892	0.9049	5.1615
2008—2012	-1.0865	-0.9708	-1.2885	-1.7299	-1.3030	0.2484	-0.5882	2.1003
2013—2017	-1.5840	-0.6812	-0.9266	-0.9305	-1.6434	-0.2134	-0.5040	0.1473

3. 2009—2015 年居民消费结构动态:微观数据分析结果

考虑到加总数据和异质性家户数据的相互印证,本文进一步采用 QUAIDS 模型对 2009 年、2011 年、2013 年、2015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家庭微观数据进行估计^①。本文选取家庭人口特征包括:家中是否有 60 岁及以上老人,是否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家庭成员在当地的收入水平(由问卷中的“您在当地的收入水平”量表衡量,1—5 表示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和家庭规模。

城乡居民微观数据的支出弹性估计结果显示,各项消费支出弹性的变动趋势基本与宏观数据 2008—2017 年结果一致,城乡居民总体上表现出第 I 类消费升级和第 II 类消费升级,2013 年后居住支出弹性的上升对其他消费分项有挤出效应。研究结果亦表明房价上涨、人口老龄化、教育水平差距、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升级的潜在原因。城镇家庭异质性主要表现在:老龄家庭、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低的城镇居民衣着支出弹性小于非老龄家庭、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高的城镇居民。2013 年后,老龄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家庭规模较大的家庭在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分项的支出弹性下降显著。乡村家庭异质性表现在:收入水平较低的乡村家庭衣着支出弹性相较于收入水平高的乡村家庭要小。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水平更高的乡村家庭居住支出弹性更高,表明其对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文教娱乐支出弹性的大幅下降主要体现在教育水平较低的乡村家庭。在宏微观数据相互印证中可以发现,宏观数据的优点在于估计结果稳健,可以体现出消费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微观数据的优点在于可以考虑家庭异质性,但由于微观家庭调查会受到家庭自我汇报准确性和不可观测的经济、非经济因素的复杂影响,估计结果偏差较大。

4. 习惯形成、信息粘性、耐久效应与消费增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从以上运用 AIDS 模型与 QUAIDS 模型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虽然城乡居民表现出不同的消费结构特征,但是随着时间阶段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消费结构比例调整,表现为第 I 类消费升级和第 II 类消费升级。以下本文将重点分析城乡居民在总消费支出及各类消费支出中体现出怎样的消费习惯,是否存在消费粘性效应或耐久效应,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对于有效效应的可能影响。为了考察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否存在显著的粘性特征或耐久效应,以及消费效应与消费结构的相互影响,本文在 Carroll et al.(2011,2018)的粘性消费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消费结构对消费增长的可能影响以及对消费粘性系数(即消费增长率的一阶自相关系数)的调节效应,并使用五年期国债利率(取对数)与各省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如下估计方程:

$$\Delta \ln c_{it} = \beta_0 + \beta_1 \Delta \ln C_{i,t-1} + \beta_2 \Delta \ln Y_{it} + \beta_3 STR_{it} + \beta_4 str_{it} \times \Delta \ln C_{i,t-1} + \beta_5 \ln R_t + \beta_6 P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9)$$

其中, i 代表的是不同省市, t 为年份; C_{it} 为居民人均总消费支出和各项人均消费支出; Y_{it} 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STR_{it} 为消费结构虚拟变量,根据联合国标准,一国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50%—60%属于温饱,40%—50%为小康,本文定义在恩格尔系数大于等于 40%时 $STR_{it}=1$,反之则为 0; R_t 为当年五年期国债利率; P_{it} 代表当年该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μ_i 为个体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当居民消费行为符合 Hall(1978)的随机游走模型时, $\beta_1=\beta_2=0$,表明居民的消费行为既不受当期收入影响,也不受滞后一期消费的影响;若居民消费行为符合 Campbell and Mankiw(1990)的经验法则,则 β_2 显著为正,其原因可能是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或个体消费决策的短视行为使消费不再平滑;若 β_1 显著为正,则表明居民的消费行为表现为习惯形成(Muellbauer, 1988; Dynan, 2000)或粘性

^① 具体估计结果可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journal.org>)下载。

效应(Carroll, 2006)。Muellbauer(1988)和 Dynan(2000)认为 β_1 显著为正表示当期消费变化与滞后一期的消费变化之间满足一阶自回归过程,消费具有习惯形成效应,Carroll(2006)则认为表示具有 $1-\beta_1$ 比例的消费者可以自己更新消费信息, β_1 比例的消费者行为表现为粘性信息。因此,本文把 $\beta_1 > 0$ 时的消费者行为概括为粘性效应;若 β_1 显著为负,则居民的消费行为体现出一定的耐久效应。

考虑到统计局对人民生活统计调查的统计口径在 2013 年发生改变,2013 年以后为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而 2012 年及以前分别开展城镇住户调查和乡村住户调查,本文在估计粘性消费增长模型时分为 1998—2012 年与 2013—2017 年两个时间阶段。1998—2012 年的样本采用稳健的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tem-GMM 估计上述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系统内部工具变量处理动态面板方程内生性问题。表 5 报告了城乡样本的所有检验与估计结果。由于 2013—2017 年数据为短面板,本文使用 Hausman 检验来确定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均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使用随机效应极大似然估计(RE-MLE)方法来对参数进行估计^①。

(1)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估计结果分析。根据表 5 报告结果,1998—2012 年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呈现出轻微的粘性消费增长特征,2013—2017 年无论是粘性效应还是耐久效应均不显著,体现出符合经验法则的规律。粘性系数小说明城镇居民的 habit 形成或粘性信息制约较小,表明其有较好的消费增长意愿,结合前述 AIDS 估计结果可知,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居民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不断升级。2013 年后粘性效应不显著,这一阶段居民消费增长特征更符合经验法则的规律,消费潜力释放趋缓,结合前述 AIDS 估计结果中居住类支出弹性出现大幅上涨,这可能的解释是消费增长面临居住借贷的挤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加入交互项后的模型估计显示,1998—2017 年恩格尔系数在 40% 以上的城镇居民呈现较为显著的耐久效应,这反映了高恩格尔系数群体(主要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对收入预期、经济前景等更敏感,倾向于延迟消费。2013 年后消费结构虚拟变量与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交叉项的估计系数达到 -0.45、-0.46,绝对值远高于中国前期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表 6 报告了城镇居民分项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从分项支出看,1998—2012 年食品、衣着、医疗保健表现出轻微的耐久,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系数显著。2013—2017 年除了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分项,支出滞后一期系数显著,表现出轻微的耐久效应,其他分项消费支出滞后一期都不显著。不同消费分项支出在考虑了消费结构虚拟变量与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交叉项,恩格尔系数在 40% 以上的城镇居民呈现耐久系数变大或粘性消费增长,这反映了高恩格尔系数群体(主要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受到粘性信息或习惯形成的制约更大,跨期消费支出之间的替代更强。

(2)乡村居民消费增长估计结果分析。表 7 的模型(1)和(5)估计结果显示,1998—2017 年中国乡村居民总体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耐久效应的特征,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系数的绝对值较城镇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与城镇居民消费意愿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表明乡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意愿受到了粘性信息或习惯的制约,跨期消费支出的波动性较大,同时也表明乡村居民消费增长意愿受到了粘性信息或习惯的制约。从模型(2)和(4)的估计结果看,1998—2012 年的耐久效应主要是由恩格尔系数大于 40% 的居民群体延迟消费引致。

表 8 报告了乡村居民分项消费支出有关效应的估计情况。1998—2012 年,与城镇居民估计结果形成对比,乡村居民在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分项支出中都体现出符合经验法则的规律,表现出对当期收入的敏感,在设备与日用品、医疗保健分项支出中表现出较大耐久效应。恩格

^①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可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journal.org>)下载。

表 5 城镇居民总体支出估计结果

	1998—2012				2013—2017			
因变量:人均消费支出 (对数差分)	(1)	(2)	(3)	(4)	(5)	(6)	(7)	(8)
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0.0331** (2.04)	0.1190** (1.97)	0.0356** (2.28)	0.1060* (1.92)	-0.0111 (-0.20)	-0.0028 (-0.05)	-0.0244 (-0.42)	-0.0202 (-0.36)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差分)	0.9370*** (14.50)	0.9250*** (14.09)	0.9460*** (12.30)	0.9120*** (11.18)	0.4280* (1.82)	0.5210* (1.92)	0.3890 (1.61)	0.4540 (1.62)
消费结构虚拟变量		0.0107 (1.28)		0.0103 (1.28)		0.0706** (2.31)		0.0738** (2.43)
消费结构虚拟变量×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0.2130*** (-2.73)		-0.2100*** (-3.22)		-0.4530* (-1.94)		-0.4560* (-1.96)
五年国债利率(对数)			-0.0048 (-0.41)	-0.0040 (-0.35)			0.0211 (0.88)	0.0266 (1.1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0000 (0.13)	-0.0000 (-0.13)			-0.0001 (-0.27)	-0.0010 (-0.30)
截距	-0.0084 (-1.36)	-0.0127 (-1.31)	-0.0062 (-0.37)	-0.0029 (-0.16)	0.0261* (1.85)	0.0193 (1.16)	0.0072 (0.14)	-0.0053 (-0.10)
Wald 检验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Sargan 检验 P 值	0.9576	0.9508	0.9625	0.9788				
AR(1)检验 P 值	0.0051	0.0003	0.0050	0.0003				
AR(2)检验 P 值	0.2523	0.3873	0.2648	0.5459				
观测值	402	402	402	402	93	93	93	93

注:括号内为相应的 z 值;*,**、***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尔系数大于 40%的人群在食物、设备与日用品、医疗保健分项支出上表现出耐久效应。2013—2017 年,乡村居民在食品、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支出中表现出轻微耐久效应或轻微的粘性效应,表明乡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在这一阶段有转变。恩格尔系数大于 40%的人群在居住分项上表现出耐久效应,但在医疗保健上表现出较大的粘性效应,表明乡村居民在医疗保健支出上受到粘性信息或习惯形成的影响。

(3)本部分研究总结。综上,从总消费支出看,城镇居民较乡村居民表现出消费增长受到粘性信息或习惯形成的影响更少,但 2013 年后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更符合经验法则的规律,表现出消费增长趋缓并受到当期流动性约束影响。这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长乡村居民的消费增长潜力会进一步释放。从消费分项上看,城乡居民异质性较大,城镇居民大部分分项消费支出滞后一期都不显著,乡村居民在主要消费分项上表现出的特征是受到当期的流动性约束。考虑了恩格尔系数大于 40%的城乡居民总消费支出和分项消费支出的特征,结果表明消费结构不好的群体存在更大的耐久或粘性效应,表现为跨期消费支出之间的替代或较强相关,受到更多粘性信息或习惯形成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乡村居民中恩格尔系数小于 40%的群体表现出更好的消费增长特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比乡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限制更少,恩格尔系数小的群体消费增长受到的限制更少,未来消费增长的潜力更大。这也提醒未来政策应更多关注乡村振兴和恩格尔系数大于 40%的人群。

表 6 城镇居民分项消费支出的行为特征

消费分项支出	1998—2012		2013—2017	
	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消费结构虚拟变量 \times 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消费结构虚拟变量 \times 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食品	-0.1178** (-2.37)	0.0009 (0.02)	-0.0644 (-0.91)	-0.2568 (-0.95)
衣着	-0.1792*** (-3.10)	-2.0830*** (-3.55)	-0.0390 (-0.57)	-0.2766 (-0.68)
居住	-0.1044 (-1.54)	-0.2983** (-2.42)	0.0054 (0.13)	-0.0160 (-0.29)
设备与日用品	-0.1063 (-1.24)	-0.1510 (-1.01)	-0.1252 (-1.56)	-0.5522*** (-4.06)
交通通信	-0.0789 (-1.53)	0.1900** (2.03)	-0.2195** (-2.55)	0.2899** (2.02)
文教娱乐	0.1198** (2.48)	-0.1531*** (-2.75)	-0.0830 (-1.24)	0.2461** (2.39)
医疗保健	-0.1379** (-2.43)	-0.1172 (-1.04)	-0.1130** (-1.47)	0.8607 (1.57)
其他	0.0602 (1.01)	-0.2346* (-1.77)	-0.3702*** (-4.07)	-0.2149 (-0.44)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围绕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动态演变,分别从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两个层面对消费升级内涵进行分析。其中,结构部分使用家庭微观数据与宏观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了相互印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消费结构动态变化看城乡居民消费总体上均表现出消费升级特征,表现为从生存型向享受和发展型、从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但近年来居住支出的增加表现出对其他消费支出的挤出。消费增长估计结果显示乡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制约因素更多,恩格尔系数大的群体消费增长受到的制约因素更多,宏观上表现为受到习惯形成的影响或粘性效应、耐久效应较大。这说明在当前城乡居民消费整体上呈现不断升级的同时,部分人群也存在着降级或不升级的消费现象。这为存在着“低档品销量上升”的消费降级问题提供了几点可能的解释,一方面是居住支出上升对其他类别消费的挤出,另一方面是乡村居民或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人群由于预算约束、习惯形成、粘性信息的制约,其消费对当期收入敏感或表现出跨期消费波动较大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消费意愿的提高。这也提示未来政策的着力点需要更多关注乡村居民和恩格尔系数大于40%的人群。本文研究为考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一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研究结论有以下启示意义。

应正确理解和把握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现象与本质,更具针对性地引导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研究显示,城镇居民的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居住等消费分项的支出弹性较大,而乡村居民在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居住、医疗保健、设备与日用品等分项的支出弹性都接近于1,显示出其消费分项支出的增长速度几乎与收入增长速度同步,这表明乡村居民的消费增长易受到流动性约束制约,同时也表明未来收入的提升将使乡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包含了家庭人口特征的微

表 7 乡村居民总体支出估计结果

	1998—2012				2013—2017			
	(1)	(2)	(3)	(4)	(5)	(6)	(7)	(8)
因变量: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0.3862*** (-14.86)	0.4706** (2.55)	-0.3991*** (-14.32)	0.4882** (2.28)	-0.5566*** (-10.10)	-0.5536*** (-9.80)	-0.0506 (-1.42)	-0.0532 (-1.52)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差分)	1.2422*** (9.75)	1.2784*** (11.19)	1.1430*** (7.61)	1.1508*** (7.69)	2.2763** (2.34)	2.1322** (2.05)	0.9741** (2.26)	0.6770 (1.51)
消费结构虚拟变量		0.1607*** (3.79)		0.0966** (2.55)		0.0183 (0.50)		0.0050 (0.33)
消费结构虚拟变量×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0.9172*** (-4.77)		-0.9465*** (-4.24)		-0.0207 (-0.12)		0.1431* (1.93)
五年国债利率(对数)			0.2038*** (7.22)	0.2069*** (6.02)			-1.1712*** (-19.62)	-1.1850*** (-20.2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0041*** (-6.64)	-0.0050*** (-5.96)			-0.003*** (-5.27)	-0.0026*** (-5.26)
截距	0.0631*** (8.84)	-0.0787* (-1.95)	0.2735*** (5.56)	0.2702*** (3.43)	-0.1628** (-2.43)	-0.1547** (-2.20)	2.071*** (16.02)	2.0711*** (16.58)
Wald 检验 P 值	0.0000	0.0000	0.000	0.0000				
Sargan 检验 P 值	0.9357	0.9423	0.9374	0.9409				
AR(1)检验 P 值	0.1088	0.0108	0.0146	0.0058				
AR(2)检验 P 值	—	0.3724	0.5691	0.9148				
观测值	402	402	402	402	93	93	93	93

观数据分析也显示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将影响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及其变化。因此,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存在异质性,其消费升级的追求和实现路径也应不同,城乡促进消费的政策着力点应有差别。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受流动性约束较小,对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新型消费的支出意愿较高,可以通过产品供给侧改革,创新新产品和新的消费模式如线上线下结合的新零售等,满足其全方面深层次的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而乡村促进消费的政策着力点应该更多体现在乡村振兴和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上,如实施精准扶贫提高乡村居民收入,完善乡村地区的文教娱乐基础设施,提高其支出意愿等。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消费结构的优化将有利于消费增长行为转变,特别是对于乡村居民和恩格尔系数大于 40%的人群。这表明,收入增长转变为居民消费意愿会受到较多因素的制约。根据本文研究结果,城乡居民的消费增长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城镇居民更多地受到习惯形成或粘性信息的影响,乡村居民更多地表现出耐久或受到当期流动性约束的制约。城乡样本的估计结果都表明,积极促进城乡居民的消费升级除了要促进其对新兴消费项目的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外,还需要关注收入差距、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的限制,特别是恩格尔系数大于 40%人群的消费结构优化。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体系,降低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收入可持续增长是

表 8 乡村居民分项消费支出的行为特征

	1998—2012		2013—2017	
	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消费结构虚拟变量 \times 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消费结构虚拟变量 \times 滞后一期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差分)
食品	-0.2319 (-1.64)	-0.2538* (-1.76)	-0.1305*** (-3.32)	0.1386 (1.28)
衣着	-0.1317 (-1.35)	0.0314 (0.22)	-0.0468 (-1.08)	-0.0789 (-0.75)
居住	-0.1599 (-1.02)	-0.2147 (-1.28)	0.0617* (1.76)	-0.0726* (-1.69)
设备与日用品	-0.3566*** (-5.29)	0.1280 (1.17)	-0.0852 (-1.64)	0.0075 (0.06)
交通通信	-0.1369 (-0.75)	-0.1603 (-0.80)	-0.1992*** (-3.40)	-0.0302 (-0.15)
文教娱乐	-0.2009 (-0.84)	-0.1592 (-0.62)	-0.1766*** (-5.59)	0.0157 (0.28)
医疗保健	-0.3873*** (-3.26)	-0.2536* (-1.90)	-0.0959 (-1.64)	0.4372** (2.44)
其他	-0.1690* (-1.65)	-0.0726 (-0.53)	-0.0146 (-0.22)	0.3509* (1.69)

居民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因。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当期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十分显著,这表明城乡居民消费增长未来还会受到收入不确定性的制约。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减少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稳定消费增长,推动消费升级。如减轻居民的居住压力,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提高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等。同时,本文还发现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的自价格弹性均持续小于1,价格敏感度较低,这表明医疗服务对城乡居民而言属于刚需。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医疗保健服务供给的增加,如完善城乡居民的大病保险制度,在乡村地区实施健康扶贫等,既可以较好满足城乡居民的医疗需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进一步推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和促进消费升级,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

[参考文献]

- [1]艾春荣,汪伟.习惯偏好下的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98-114.
- [2]杭斌,闫新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居民消费行为——基于习惯形成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3,(4):1191-1208.
- [3]黄隽,李冀恺.中国消费升级的特征、度量与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8,(4):94-101.
- [4]黄群慧.“新常态”、工业化后期与工业增长新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5-19.
- [5]黄娅娜,宗庆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效应[J].经济研究,2014,(1):17-28.
- [6]厉以宁.消费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7]彭兴韵.粘性信息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11,(12):138-151.
- [8]石明明,刘向东.空间、消费黏性与中国低消费率之谜[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3):46-56.

- [9]宋明月,臧旭恒. 不确定性、粘性信息的叠加效应与我国乡村消费潜力释放[J]. 经济评论, 2018,(3):129-141.
- [10]谭涛,张燕媛,何军.中国乡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弹性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4,(3):63-69.
- [11]唐琦,夏庆杰,李实.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分析:1995—2013[J]. 经济研究, 2018,(2):35-49.
- [12]田晖. 消费经济学[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6.
- [13]王一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进与创新[J]. 管理世界, 2018,(3):1-10.
- [14]王勇. 食品价格波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 CFPS2014 数据的分析[J]. 调研世界, 2018,(8):40-48.
- [15]薛荣久. 入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意义、作用与维护[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10):1-15.
- [16]尹世杰. 消费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17]元惠连,夏庆杰,王志伟.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分析[J]. 经济科学, 2016,(4):54-64.
- [18]张慧芳,朱雅玲. 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关系演化的差异研究——基于 AIDS 扩展模型[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7,(12):23-35.
- [19]张明杨,章棋. 乡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研究——一个解决支出约束和嵌入人口统计学特征的 QUAIDS 模型的应用[J]. 消费经济, 2015,(6):27-33.
- [20]张颖熙. 中国城镇居民服务消费需求弹性研究——基于 QUAIDS 模型的分析[J]. 财贸经济, 2014,(5):127-135.
- [21]赵昕东,汪勇. 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与福利的影响——基于 QUAIDS 模型的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3,(8):154-162.
- [22]Anderson, G., and R. Blundell. Testing Restrictions in a Flexible Dynamic Demand System: An Application to Consumers' Expenditure in Canad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3,50(3):397-410.
- [23]Banks, J., R. Blundell., and A. Lewbel. Quadratic Engel Curves and Consumer Demand[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7,79(4):527-539.
- [24]Blanciforti L., and R. D. Green.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Incorporating Habits: An Analysis of Expenditures on Food and Aggregate Commodity Group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3, 65(3):511-515.
- [25]Blundell, R., M. Browning., and C. Meghir. Consumer Demand and the Life-Cycle Allocation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61(1):57-80.
- [26]Campbell, J. Y., and N. G. Mankiw. Permanent Income, Current Income, and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990,8(3):265-279.
- [27]Carroll, C. D. Macroeconomic Expectations of Households and Professional Forecaster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118(1):269-298.
- [28]Carroll, C. D. Consumption and Saving: Theory and Evidence[R]. NBER Working Paper, 2006.
- [29]Carroll, C. D., E. Crawley, and J. Slacalek. Sticky Expectations and Consumption Dynamics [R]. NBER Working Paper, 2018.
- [30]Carroll, C. D., J. Overland, and D. N. Weil. Comparison Utility in a Growth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7,2(4):339-367.
- [31]Carroll, C. D., J. Overland, and D. N. Weil. Saving and Growth with Habit 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90(3):341-355.
- [32]Carroll, C.D., J. Slacalek., and M. Sommer.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Sticky Consumption Growth[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93(4):1135-1145.
- [33]Deaton, A., and J. Muellbauer. An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 (3):312-326.
- [34]Dynan, K. E. Habit Formation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90(3):391-406.

- [35]Fischer, S. Long-Term Contract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85(1):191-205.
- [36]Hall, R.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86(6),971-987.
- [37]Lucas, R. E.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3):326-334.
- [38]Mankiw, N. G., and R. Reis. Sticky Information Versus Sticky Prices: A Proposal to Replace the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117(4):1295-1328.
- [39]Muellbauer, J. Habits, Rationality and Myopia in the Life -Cycle Consumption Function [J].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8,112(9):47-70.
- [40]Poi, B. P. Three Essays in Applied Econometrics[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 [41]Poi, B. P. Easy Demand-System Estimation with QUAIDS[J]. Stata Journal, 2012,12(3):433-446.
- [42]Ryder, H. E., and G. Heal. Optimal Growth with Intertemporally Dependent Preferenc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3,40(1):1-31.
- [43]Taylor, L. D., and H. S. Houthakker. Consumer Dem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ces, Income,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0.

Consumption Upgrading or Downgrading

SHI Ming-ming¹, JIANG Zhou¹, ZHOU Xiao-yan²

(1.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Krannert School of Management,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 47907, USA)

Abstract: “Consumption upgrade”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notation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from two aspects and does researches on dynamic evolu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part uses micro-data and macro-data to verify each oth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8—2017, the first type of consumption upgrade (the decline in the proportion of food consumption) and the second type of consumption upgrade (the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symbolic and servic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re going on. The first type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is less significant among rural residents. After 2013, with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China’s macro economy, the second type of consumption upgrade slows down and the expenditure on housing has a large crowding out effect on other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of consumption growth model estimation show that there is a large heterogeneity in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residents with the Engel’s coefficient more than 40% and residents with the Engel’s coefficient less than 40%. Rural residents and residents with Engel coefficient more than 40% are subject to more restrictions on their consumption growth. The study provides several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consumption degradation phenomenon.

Key Words: consumption upgrading; consumption downgrading; sticky consumption growth;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JEL Classification: D11 D12 R22

[责任编辑:王燕梅]